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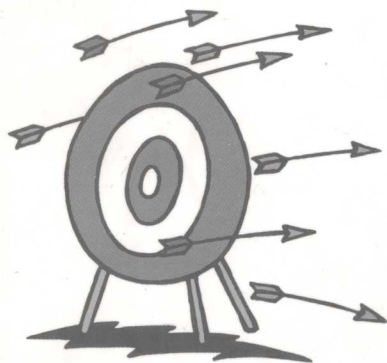
历史与叙事

戴 清 ○ 著

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

与文化批评



學苑出版社

历史与叙事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批评

戴 清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与叙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批评/戴清著. -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4

(学苑文丛)

ISBN 7-80060-017-3

I. 历… II. 戴…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5786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 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总编室电话:010-68281490 发行部电话:010-68279295

E-mail: xueyuan@public.bta.net.cn

河北省高碑店市鑫昊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50×1168 32 开本 9.25 印张 185 千字

2002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3000 册 定价:20.00 元

目 录

批评的困惑与追索(代序)	(1)
--------------------	-----

历史 / 叙事

历史·时代·叙事

——《故事新编》与《豕蹄》之比较	(19)
------------------------	------

传奇·反传奇·非传奇

——重读张爱玲的“传奇”世界	(40)
----------------------	------

钱锺书研究二题	(67)
---------------	------

“新历史” / 叙事

“文革”时期长篇小说分析	(93)
--------------------	------

文化转型中的散文个性考量	(145)
--------------------	-------

“新历史” / 叙事:徘徊在古典与先锋之间

——对苏童“新历史”小说的再评价	(167)
------------------------	-------

魔幻、诱惑与毁灭

——对莫言《怀抱鲜花的女人》等“邂逅”小说的 原型批评	(187)
--------------------------------------	-------

影像 / 叙事

叙事差异、女性话题及其他

——对《大宅门》的文化阐释	(209)
---------------------	-------

悖论与代价:关于大陆偶像文化发育现状的思考	(225)
江山代有偶像出 各领风骚若干年	
——20 世纪偶像形象迭变及其阐释	(238)
荒芜英雄路	
——当代银屏英雄形象类型的迭变及其阐释	(252)
触摸历史 诠释历史	
——评《解放战争著名战役系列片》	(264)
理性、知性与权威性	
——评《中国报道》国际选题的节目特色	(273)
参考书目	(283)
后记	(288)

批评的困惑与追索

(代序)

九十年代以来,文学批评所面临的危机是学界同人有目共睹的。它既失去了新时期那种启蒙大众思想、引领大众审美方向的“灵魂猎手”兼思想导师的地位,又丧失了八十年代中后期短暂的推出先锋小说家的类似“造星”似的神奇魔力,从而和小说创作的私语化、边缘化一道被挤到一个个以批评谋生或借批评谋生的学院派人士的书桌上。从批评的外部文化环境来说(对这种环境几乎无人可以扭转乾坤),影视传媒的发展,大大冲击了印刷传媒的影响力,小说都很少人看了,批评小说的文章自然更少人去问津,批评本身也就愈发成为一种职业行为或者说一种小圈子文化了。相对于创作队伍而言,它的职业化程度要高得多,这也是迥异于十九世纪以前甚至二十世纪前半半个世纪的情形的。批评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及学院化倾向既是批评发展成熟的标志,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丧失它原初的某些生机。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批评的状况,可以说它的尴尬是历史性的,也是无法逆转的。难怪有偏激敏感的评家会为文学与批评写了悼词呢。^[1]除了外在的文化背景,还需要检视的是批评内在的建设状况。首先,不可忽视的是当下批评中存在的一种“自说自话”的情形,而这是由理论与创作的双重模糊状态所导致的。

一 双重模糊下的“自说自话”

从理论上来看,上个世纪末以来的二十年里,我们把西方二十世纪的各种批评理论流派快速地一一引进,翻开任何一本最新的介绍西方文学理论的著作,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阐释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等流派都被一一介绍着、评说着。由于时间紧,任务急(理论译介工作面临着几重的任务压力,一是国外新理论、新学说不断涌现的压力;其次是在西方影响下的国内创作界的精彩纷呈;再次是占据学术制高点,抢夺发言权的压力,等等),这种评介工作就很难做到深入、系统。而对西方理论抱有极大希望的人们在接受与使用上更是存在着一种快餐式的进补方式。同样由于时间紧,任务急,接受时也不可避免地显得仓促,使用理论时往往有鲁迅先生做历史小说的姿态:“取其一点因由,随意点染”,也就是抽取某一理论中的一点特别“好用”的成份,去对自己的阅读对象进行说明。这样就难以避免批评中存在的支离破碎、语焉不详的情形。

另外,由于国人思维的特点以及我们特殊的接受语境,面对西方各种理论流派时,更倾向于对其进行价值判断,而不是注重它们在方法论上的意义。因而理论界与批评界对各西方理论流

〔1〕青年评论家葛红兵的文章,言辞极为激烈。他认为,“90年代以来文坛批评是缺席的……批评平庸化了……”《文艺报》,2000年3月21日。

派并非等量齐观,一视同仁。对其中更偏重于方法论层面的理论流派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等加以深入研究的比较欠缺,而对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文化研究这些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与价值判断倾向的学说往往青睐有加。^{〔1〕}在利用以上理论资源进行批评时,批评者的姿态往往存在这种倾向,即对这些学说所产生的语境与具体学说之间的内在关联并不特别关注,而是抱着一贯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传统,以西方理论的一些新说法来解释中国的文本以及文化现象。这也难以避免牵强附会、生搬硬套的毛病。

再则,评说对象本身——文学现象本来又是一个与感受密切相关对象。这样批评对象、批评工具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双重的模糊,这种模糊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批评界存在的严重的自说自话现象。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毫不相干。有时好像大家在谈一个事情,谈得很热闹,比如对先锋小说、新写实主义、后现代主义、人文精神等问题,而仔细考察,不难发现实际上

〔1〕九十年代文化研究的兴起,可说是一个重要的佐证。一方面,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姿态恰好为一些具有同样思路的学人提供了新的思想动力源;另一方面,文学在失去了轰动效应之后,一些学人也不愿意再在以往那些注重方法论研究的西方批评流派(比如很热过一阵的叙事学研究)中徜徉。文化研究本身的跨学科性使得它一出现,就伴生了很多问题。如北京大学的温儒敏先生在2000年度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研讨会上所说的,“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或学科分支,应有自己的目标、理路、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同时指出,目前的文化研究有“泛化”的倾向,使得学术论文质量有所下降。——白烨选编:《2000中国年度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1年版,394页。

各自话语的背景、出处、指向又并非在同一个层面、同一个问题上。恰如一位学者所感叹的：“……有感于中国学界喜欢‘望文生义’，好多争论实源于双方（甚至是三方或四方）对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很难真正对话……”〔1〕

然而这种个体的差异性与模糊性却往往被习惯于贴标签式的流派归总所忽略了。于是批评对象与批评者本身的个性也就淹没在这种大而化之的归结之中。应该说，批评家追踪新潮作家们的最新创作动向并及时加以理论上的阐释与归纳确实是一项很必要的工作，但如果我们的文学批评仅仅满足于这种亦步亦趋的追踪与归纳却是明显不够的。贴标签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关注标签之下的批评对象个体的丰富性与彼此的差异性、各自风格的发展演变及其与中外文学传统之间的联系。

应该说，这种不尽如人意的批评风气的形成，除了学术品格上存在的问题外，从根本上说也是与二十世纪西方认识论哲学与语言论哲学带来的影响分不开的。二十世纪人们在认识世界、认识历史的思维视野上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这就是不再奉本质论为圭臬，而是更多地认识到认识主体的作用以及认识的途径——语言工具的力量及其局限。应该说，这是二十世纪并不亚于电脑出现的思维观念上的一个革命性飞跃。但是，这种理论在很多时候又会诱导人们陷入不可知论与相对主义的纠缠之中。体现在文学批评上，是因这种理论阴影的干扰而纷纷陷

〔1〕陈平原：《小说类型与小说史研究》，陈平原、陈国球主编：《文学史》（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3页。

人不置可否的困惑与尴尬中。这里,一位学者的观点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如果我们考虑德里达的看法,解读是对本文意义结构(或意义中心)的摧毁,解读实质是能指词的播散活动,这样,我们认可语言符号总是区分(differ)和拖延(defer)的奇怪的双重运动,我们能够理解什么和理解了什么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理解的是什么呢?是一则本文的意义,还是隐藏在本文里的作者的意图?或者就是理解我自己的理解?作者的意图是不可还原的,因而第一,我们为什么要把作者的意图弄个水落石出呢?本文在每一次解读中,能指词都在玩弄自我出场的游戏,同一则本文,在每一次解读中总是表达出不尽相同的意义;那么,第二,我们为什么要专注于把它的意义弄得准确无误呢?可是,第三,我的理解又如何与他人的理解沟通,既然本质上无法同一,为什么要强求沟通呢?理解只不过是“在世”的存在方式,能够开启我的思想的存在空间,能够向我展示出思维的不同进向,能够让我在这样的片刻感悟到人类心智的博大深邃——就给予了我的理解以充足的意义。事实上,所有的理解从来都是(也只能是)误解,……”^{〔1〕}在普遍抱有这样一种批评理念的情况下,文学批评的图景就只能是一种个人醉心的自说自话了。认识主体的差异性以及语言工具的隔膜性造成了哲学层面上的价值失范,它既是一种时代性的思想混乱,又似乎已经成为批评必然的文化宿命。

〔1〕陈晓明:《文学超越》,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8页。

二 “对话”的尴尬与建立体系的冲动

当下的文论界,存在着古典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前苏联传统文论以及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几大传统,也有的人认为“五四”新文化以来的文论也可构成一支。但严格地说,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论,也是上述几种文论传统的混合体,并没有形成其独具特色的现代文论体系。因此,四部分说似乎更为切合实际一些。学界对这样几个传统并存,却唯独缺少中国当代特色的文论这一现状是极为不满足的。特别是对新时期以来纷纷效法西方文学理论流派的现象更是颇多微词:认为我们的作家、作品成了西方文学批评的理论注脚;我们的文学批评只是西方文学批评术语的翻新与堆积,我们的文论建设在逐渐萎缩、贫血及文学批评的“失语”甚至“失声”——即自身民族文学批评的丧失。^{〔1〕}于是,似乎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呼唤由对西方理论的“学话”阶段进入到所谓东西方文论、批评的“对话”阶段,“改造甚至重构”,最终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文论及其批评。

应该说,这一认识既是不少专家、资深学者达成的共识,在思想倾向与学术建设上又都无懈可击,甚至可以说具有颠扑不破的真理性。未必你还要主张永远学话,永远不去和西方对话,不去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吗?问题是,价值判断的真理性并不

〔1〕曹顺庆:《从“失语症”、“话语重建”到“异质性”》,《文艺研究》,1999年4期。

等同于实践论上的可操作性。

首先需要检视的是我们的所谓内向型百家争鸣(依“学话”作者的意思是指国内学界的争鸣),即感觉外向型争鸣——与西方不能形成“对话”的格局,出现了所谓“主体的缺席”,但国内学界已经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笔者的看法恰恰相反,如今并不存在真正的争鸣,而更多的是“鸣”而不“争”,如前文分析的是“自说自话”,它并非如作者所形容的是可怜兮兮的“失声”,而是实实在在的“众声喧哗”,其中亦包括所谓酷评、炒评或骂批。应该说,这一点也已经为一些敏锐的学者所指出,“当代批评和理论很有可能出现这种局面:第一,理论在总体构造上陷于不协调的混杂,各种观点和见解搅和在一起,理论总体构成不可避免地出现内在矛盾……第二,兼收并蓄一旦为各取所需代替,那么,每个人选取了一种理论参照系,相互之间将无法对话……”(1)

在此,笔者还想追问的是,除了价值失范、思想参照系的错乱,是不是还有其它的原因?事实上,从事当代文论建设、文学批评的学界中人(特别是活跃分子)几乎都在承袭着西方文论的衣钵。只是所宗的流派存在一些差异而已。固然,二十世纪西方批评理论流派纷呈、各执一端、大异其趣,但是这股热却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为什么没办法“争鸣”起来呢?而让人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一种情绪化的支持或不满呢?这里,恐怕有一个学界未必肯正视的因素。这就是,西方的文论发展实在是太精深、细

〔1〕陈晓明:《文学超越》,28—29页。

致了。这对惯于大气包举、惯于感性思维的中国文论界、批评界来说,实在是一块块不好啃的硬骨头。之所以说它硬,一是隔着一层语言的障碍;二是隔着西方文论脱胎而出的各种理论语境,比如精神分析之于生理学、叙事学之于语言学、新历史主义之于历史学、女权主义之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等等。如果肯老实一点,我们就不能不想起一句老话,隔行如隔山。在学科分类如此之细、专业化程度如此之高的现代社会,想再做一个横扫一切的百科全书式的歌德概率几乎为零了。于是,西方的那些被我们奉为大师者,如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赛义德等,一辈子也就在自己的那一块园地里发言,尽管仍是自说自话,但自有其逻辑的自恰性与学理的严肃性。我们这里则不然,如前文分析的,时间紧、任务急,造成了翻译是速成的、阅读是生吞活剥的、传播更是充满了误读。它使得文论界、批评界和大众在大快朵颐的同时,也必然消化不良。更有甚者,误以为读了几册并不准确、精妙的译著就自认掌握了大家治学半辈子的精华。这不是有囫囵吞枣、盲目自信的因素呢?

翻译作为沟通东西文化的一座有力桥梁,应该说功不可没。研究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文化的发展,不能绕开对翻译、引进这一项工程的考量。反观当下一些译著(只是一些),不难发现其质量的粗糙,更谈不上翻译的艺术,诸如信、达、雅的要求。它给当今文论界、批评界造成了很多问题,话语混乱、自说自话恐怕也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另外,文化转型中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对学术成果的追求超过了对学术问题进行论争的热情,而对学术问题论争的热情又

超过了对社会问题的关心。这样就形成了学术界的一种双重回避,首先是对很多社会问题视而不见(当然也有很多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所谓专业人士的姿态;^[1]其次是对学术论争的回避。后者或是出于清高,不争未必苟同,而是不屑,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清高者洁身自好,惟恐落入拉名人论战以扬己名的世俗陷阱,自然不愿自降身份,授人以柄;或者是避免得罪人、伤和气,如某位学者谈到的,“这个专业面对的基本上是活人,它没有办法不陷在人情的泥沼中”;^[2]或者是因为不读书,准确地说,是不读观点不一者的书。因为圈子文化的盛行,学界中人读同行者的书大多是赠书,而道不同者送书的例子自然也就小得多,于是,竟读不到这些人的书。既不读书,又怎能争鸣?如此一来,也就只能“自说自话”、“鸣”而不“争”了。

下面的一个问题是,现在是该从“学话”进入到“对话”的阶段了吗?笔者以为不然。原因如上分析,很简单,是因为还没有学会、学好。当下普遍认为中国文论、批评面对西方是“主体缺席”、“失语”状态。但在我看来,中国人学习的能力和耐心实在是欠佳,但化用功夫却委实不低。就拿这个“对话”来说,从巴赫金读解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产生的这样一个专门术语,到如今的语义的内涵与外延无限扩大,并轻易实现了从学术界到流

[1] 专业姿态既是学术规范化的标志,也可以成为学者回避社会问题的一个有力盾牌,而回避并不只是学者自身的问题,它涉及到人文环境、学术体制等等外在因素。

[2] 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369页。

行圈的跨越,成为无处不在的一个时髦用语。而完全不顾及当初出现时的语境、语义,翻译过来时之所以选择中文的这一对应词汇的原因等等。类似的语汇还有很多,譬如“误读”、“建构”、“解构”、“宏大叙事”等等都存在剥离语境随意使用的现象。化用的好处虽然很多,但庸俗化、随意性的毛病却不可不正视。同时,概念的偷换,使原本的语境、语义被剥离了、抛弃了、改变了,但用的时候却完全不去考虑。正如一位学者批评的,满嘴新名词,却犯了知识社会学的大忌:语境抽离。这也造成了争鸣的难度,讨论的东西本来就隔着语言的屏障、专业的屏障,再加上各自化用的成份,怎么争鸣得清楚?真理不是越辩越明,而成了名副其实的打乱仗了。因此,为省心省力,还是各说各的,不争为妙。

接下来需要质疑的是“实现对话”、“融会古今、沟通东西,建立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本身,在思想层面与操作层面,笔者以为都为时尚早。首先,对话建立在双方彼此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就我们对西方的了解来看,存在着如上分析那样多的欠缺,还不包括当今大部分研究西方文论的学者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国学基础薄弱,对古典文化的研究并未达到很高水平这个致命的弱点。而西人对我们的了解就更差得太远,我们毕竟还有一些学者能操一口或流利或夹生的英语,西方的学者中,汉学家与文论研究者几乎没有一身二任的(不妨去统计),西方理论的始作俑者们有几个了解中国古典、现当代文学、文论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更是在自说自话,比我们的程度更高,只是比我们认真而已。在这种情况下,谈“对话”,是不是太一相情愿了?有

的人可能会反驳说,语言的障碍并不足以裹住“对话”的脚步。但事实上,文学理论与批评比任何学科都更依赖于语言本身。仔细审视我们的文学批评理论领域,因为缺乏固有的力量,古典文论又在整体上显得过时,于是只能对西方理论亦步亦趋。又怎能要求西方人产生与你对话的欲望,那些读懂了一点西方理论的国际学者们也不过是充当一个聆听者或者来自第三世界的阐释者而已,又焉能奢谈对话?因此,笔者以为,在目前的状况下,我们的态度既然不能关起门来(那将更糟),也只能是虚心学习,尽管不那么甘心。真正学懂、学透,再去批判、化用,轻易地就作一个一分为二的分析与引导,只能为投机取巧者开绿灯。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钱锺书的《谈艺录》在近些年似乎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推崇,主要原因也是他们融会古今、沟通东西作出的成绩让人佩服。但是,这里不能不提的是他们二人所处的时代赋予他们的不可多得的条件,国学的根底与西学的深厚,在此基础上谈所谓融会、沟通才有可能。但再细究一下,不难发现实际上他们也只是对西方某一哲学家、美学家思想/流派深入钻研后进行批判吸收,如王国维之于叔本华、康德;钱锺书之于波德莱尔、克尔凯郭尔、黑格尔。并且也都不是所谓理论体系式的,而是建立在对古典诗词、文论深刻理解基础之上的赏析、评论之作。准确地说,是通过批评实践凸现某种理论观念,而不是融会古今、沟通东西理论之大成。这些著作所提供的成功范例是不是也从侧面为今天那些致力于构建新的理论大厦的学者们进行着某种暗示呢。正视文学理论的几大格局并存的现状,努力将文论的研究推向深入,做某一个或两个理论/方法的

专家,不熟、不懂的地方闭紧嘴巴,那么在学术整体水平水涨船高的基础上,那种“奋袂于其间,崛然而起”的“大贤”也许会自然出现。

三 批评的困惑与追索

前文提到的学界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对人不对己的。其中大多数问题正是我在接受、运用西方理论中出现过的一些问题以及治学中走过的一些弯路。譬如缺乏对其进行足够的分析批评及其理性思辩,并没有真正地理解这些理论,也没有认识到这些理论与产生它们的社会实践及其文化土壤之间的深刻联系。更重要的是,由于还没有形成自己对世界、特别是对当下中国现状独特的认识(说句为自己开脱的话,多少也有年龄阅历的关系,对社会科学的理解恰恰离不开一个人心理的成长与思想的成熟),也就很难真正理解这些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中国文化问题之间的隔膜。于是生吞活剥、生搬硬套在所难免。写在这里,也是对自己年少时的浮躁进行一次必要的反思。然而,若干年过去,无论是自己还是外界都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些老问题,新问题却又堆叠上来,于是批评的困惑不但没有减轻,反倒加重了。很多问题并不是看不明白,而是明白了却无法改变而只能正视。这种时候批评的无力感就更凸显了,它既不能使人走出困惑,也没办法让人摆脱挣扎的痛苦,很多时候就只能是一种带着不满与追问的自说自话了。

限于功力,我无法对二十世纪的文学、文化问题进行文学史